

少年小說中的「他者」

以紐伯瑞獎得獎作品為例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前所長 青少年文學閱讀推廣人 | 張子樟

*「弱者，你的名字是他者！」

十七世紀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在他的著名劇作《哈姆雷特》（*Hamlet*）中，曾有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檢視十八世紀以來的殖民現象，把這句名言改為「弱者，你的名字是他者！」也不為過。細讀多冊描繪美國移民生活的少年小說後並加以對照，會發現這句話一點也不假。

就西方後殖民理論而言，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self），殖民地的人民則被稱為「他者」（the other）。「他者」和「自我」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以「自我」自居的西方人將非西方的世界視為「他者」，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所以，「他者」的概念實際上潛含著以西方為中心的意識型態，旨在為東西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廣泛地說，「他者」就是一個與主體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參照，比如白人可以黑人作為「他者」，那樣得出的結論白人必然是文明的、聰明的、先進的、高雅的。經由選擇和確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確定和認識「自我」。

在論及「他者」的紐伯瑞獎少年小說中，「他者」與「自我」的對比首先來自膚色。白人在新大陸站穩腳步後，開始以主人自居，當年「五月花」（the *Mayflower*）號上的祖先曾經獲得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協助，在寒冬中免於挨餓凍死的往事早已拋於腦後，不復記憶。似乎有色人種註定要扮演「他者」的角色，永遠無法翻身，難怪身穿白袍的精神科黑人醫師弗蘭茲·法農（*Frantz Fanon*）感慨萬千。他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發表於1952年，而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則於1978年出版，這兩本論及「他者」的專書問世相隔26年，但後者的「他者」已經不全然是膚色問題，殖民地與國力強弱的差異形成另外的變數。

1776年7月4日，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負責起草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有句千古不朽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但240年來，美國的種族糾紛仍然不斷，這句名言所宣揚的理想，並未完全實現。

美國是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組成的移民國家，但有色人種始終處於卑微低劣的地位，不同膚色的移民故事便是最好的見證。近年來，藉由少數移民作者的細膩刻畫，展現出百年來在美國討生活的移民們面對的種種困境，這些深刻的感受便成為他們追求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吶喊，這種逐漸累積的共識與延伸則形成了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儘管這股力量的前進步伐緩慢沉重，但只要開始邁步，總有改善的可能。下面簡介紐伯瑞獎，並例舉幾本得獎作品來說明「他者」現象。

*九十六歲的紐伯瑞獎

192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依據梅爾契爾（*Frederic Melcher*）的建議，創立了紐伯瑞獎（*Newbery Medal*），每年由該協會頒獎給前一年最傑出的童書和作者，作者限定為美國籍。

這項獎項是為了紀念十八世紀熱心兒童讀物發展的英國出版商兼書商紐伯瑞（John Newbery）而設立的，它是全世界的第一項兒童文學獎獎項。

紐伯瑞獎設立宗旨如下：鼓勵為孩子書寫童書範疇內具有創意的原作；向大眾強調童書的貢獻，與詩歌、戲劇、小說一樣，都應得到同樣的讚賞；給以服務孩童閱讀趣味為終志業的圖書館員一個機會，去鼓勵在此領域內的優秀創作。

紐伯瑞獎的評選委員多為資深圖書館館員，他們熟悉童書的各種文類。在評選作品時，必須考慮以下的條件：主題或觀念的詮釋、訊息的呈現（包括精確、清晰、有組織）、情節發展、性格刻畫、背景描寫和適當的風格。評選委員決定得獎作品是以其對文學的貢獻為主，主要考量在於文本，插圖、書的設計僅作參考。

通常每年得到紐伯瑞金牌獎（Newbery Medal Winner）的只有一名，榮譽獎則不在此限。原先的第二名（或亞軍）獎項在一九七一年改名為榮譽獎（Newbery Honor Books）。臺灣出版界習慣用金牌獎、銀牌獎來區分這兩項獎項。得獎作品仍以文學性、藝術性為主，為了適合青少年閱讀，再加上趣味性。至今得獎作品最多的是小說，主題呈現多元現象，例如談死亡與親情的《想念五月》（*Missing May*, 1993）；談納粹統治時代猶太後裔的逃亡故事《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 1990）與《樓上的房間》（*The Upstairs Room*, 1973）；談少男少女的奇特情感的《通往泰瑞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 1978）；談種族問題的《海狸的記號》（*The Sign of the Beaver*, 1984）；談人與動物的互動的《狼王的女兒》（*Julie of the wolves*, 1973）；描寫祖孫之情的《那一年在奶奶家》（*A Year Down Yonder*, 2001）。

上述作品都是寫實的，但紐伯瑞獎也容許奇幻與科幻，像《時代廣場的蟋蟀》（*The Cricket in Times Square*, 1961）、談科幻時代中親情轉變的《時間的縐紋》（*A Wrinkle in Time*, 1963）；談烏托邦幻滅的《記憶傳授人》（*The Giver*, 1994）；以怪誕手法書寫的《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 2009），以魔幻寫實展現的《木屋下的守護者》（*The Underneath*, 2008）給小讀者開了另一扇窗。

海峽兩岸的少兒出版社相當重視這項獎項，中譯本至今已超過 200 冊，對鼓勵文字閱讀方面貢獻不少。

* 作家如何詮釋「他者」

細讀紐伯瑞獎九十多年來的得獎作品，會發現這項獎項的多元性。首先，雖然限制得獎作者必須為美國人，但其中不少為移民後裔，於是我們在白人作家史畢爾（Elizabeth George Speare）的《海狸的記號》中，讀到白人如何企圖改變紅人歷史、殺害紅人、掠奪紅人土地與獵物的部分描述。緊接著我們又在非裔女作家泰勒（Mildred Taylor）《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 1976）看到白人如何以不正當的手法對待黑人，隨後又有來自亞洲的黃種移民，在華裔葉祥添（Laurence Yep）的《龍翼》（*Dragonwings*, 1976）和《龍門》（*Dragon's Gate*, 1994）、日裔角畑（Cynthia Kadohata）的《閃亮，閃亮》（*Kira, Kira*, 2005）與越裔賴曇荷（Thanhha Lai）的《再見木瓜樹》（*Inside Out & Back Again*, 2011）裡，在他鄉異地落戶，領略不同程度的酷驗，都有說不完的悲慘故事。

這些作品都涉及「他者」角色的扮演。弱勢的有色人種扮演「他者」似乎是天經地義，因為在這個所謂「人生而平等」的移民國度裡，「非我族類」的種族歧視和經濟能力往往可以決定社會地位。有趣的是，一二次大戰期間，也有部分白人擔任弱勢的「他者」，這種現象確實

驗證了「弱者，你的名字是他者」這句轉化自莎士比亞名句的真實性。

《海狸的記號》的白人作者史畢爾為紅人代言。由於書中提到《魯濱遜漂流記》這本名著，自然會涉及魯賓遜與星期五之間的主僕關係，誰是「他者」不說自明。書中主角麥特一個人苦守與父親合建的小木屋，有點類似遭遇船難，孤居荒島的魯賓遜。但麥特絕對無意扮演魯賓遜的角色。他也不敢把印第安男孩阿汀當成星期五。兩人的碰觸純屬巧合，一種魯賓遜神話幻滅的見證。救了麥特的阿汀祖父沙克尼並沒忘記白人殺戮族人與家人，霸佔祖先土地這些事，然而他們一再忍讓。祖孫二人甚至聯手救了麥特一命。他們的寬宏大量應該讓白人汗顏羞愧。

十七、十八世紀，許多黑人在西非被綁架，賣入美國當奴隸；十九世紀南北戰爭後，他們始獲自由，但在社經地位上，始終不如白人。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如火如荼般的民權運動後，黑、白兩族的平等地位才得到確定。《黑色棉花田》所描寫的，就是1930年代經濟不景氣時，密西西比州黑人反抗白人長期欺壓的故事。整本書由一連串的抗爭組合而成，描述黑人除了長期受到欺辱與歧視外，更被白人以殘忍手段對待：在黑人身上塗滿焦油、插上雞毛；甚至倒上煤油，然後點火。此外，白人還覬覦故事主角——凱西的祖父，辛苦工作所購得的四百畝土地，欺壓動作不斷。然而，苦難中的長輩卻不忘隨時給孩子機會教育，讓他們瞭解偏私與歧視對人的殘酷傷害，更承繼了驕傲、自尊與威嚴！

清末，許多大陸沿海地區的華人歷盡艱辛，遠赴美國以求溫飽，卻因為膚色不同而遭受歧視。葉添祥為美裔華人，他的少年小說題材重心在於追溯及探討早期到西部的中國移民的生活。他細心整理清末中國移民至新大陸的悲慘經歷，為祖先立傳。他爬梳各類相關資料，融合自己的想像，刻畫華裔僑民的辛酸與苦難，藉《龍翼》中的父親乘風和八歲孩子月影在三藩市的生活，描繪當年中國移民在他鄉討生活的種種困境。透過作者的敘述，讀者可看到新大陸移民生活的種種，膚色和語言能力限制了工作範圍，幫派的形成與吸食鴉片的惡習更促成當地白人歧視華人。在唐人街討生活的華人常被白人趕來趕去，生活十分不如意。讀者在閱讀中必定能體會有色人種在白人社會中討生活的種種辛酸之處。

另一本作品《龍門》講述一個深遠而感人的異鄉客居故事。十九世紀末，華人參與美國鐵路興建工程的悲歡離合是本篇的背景。主角癩皮目睹華人奴工的悲慘遭遇，又覺得中國人無法團結，本想參加炸雪的危險工作後，便一走了之。但舅舅為保護他犧牲了生命，使他不得不扛起重擔。在種族歧視與同族互相排擠之下，從逃避恐懼到勇敢面對恐懼，努力克服恐懼，主角性格的剛毅及心路歷程的轉折，為青少年做了很好的示範。

二次大戰期間，珍珠港事變後，美國被迫正式參戰，當局懷疑日裔美人的忠貞程度，曾下令日裔美人只能生活在特定地區，限制其行動。這個舉動涉及了種族歧視問題。《閃亮，閃亮》作者日裔角畑出生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六年，但她在五〇、六〇年代的遭遇，從她書中的描繪來看，改善的空間並不大。

表面看來，《閃亮，閃亮》是一本日裔美人的奮鬥故事；但實際上，它可說代表了全部有色人種，移居美國後的實際生活寫照！在一座總共只有31個日本人的小鎮生活，敘述者凱蒂深刻體認有色人種的卑微與悲哀。接二連三發生的事情，都在描述日裔美人如何在殘酷現實中努力存活的經過。我們看到了南方小鎮對外來有色移民的排斥舉動，也看到了日裔美人寄人籬下，忍氣吞聲只為求三餐溫飽的無奈。

《再見木瓜樹》以越戰為故事背景，第一部西貢與第二部海上生活是這本半自傳式小說的引言，因為如何在美國安居下來才是大難題、大考驗。表面上，當他們到了美國，事情似乎有了轉機，但必須學會一種新語言，應付一切不同的文化，而周遭的眼光時而敵視時而慷慨。他

們十分努力去融入新環境、新文化，經歷不同層次的考驗與挫折。主角依然只是個孩子，卻也必須學會去處理她的憤怒、頑固、甚至對學校霸凌者的畏懼。她的非白非黑的膚色受到同學的辱罵、追逐與嘲笑。她深刻體會到陌生人在陌生大地上的孤獨與無助。然而哥哥們知道他們沒有退路，在善心的少數鄰居的協助下，終於贏得自己應有的空間。

亞裔美籍作家得紐伯瑞獎的小說作品還有韓裔的琳達·蘇·派克（Linda Sue Park）的《碎瓷片》（*A Single Shard*, 2002）和臺裔林珮思（Grace Lin）的《月夜仙蹤》（*Where the Mountain Meets the Moon*, 2010）。《碎瓷片》和《月夜仙蹤》是東方故國文化的傳遞。他們的遭遇都和原生的民族性格以及新生的現實交融有絕對關係。

* 白人也是「他者」

在紐伯瑞獎少年小說中，弱勢的有色人種扮演「他者」似乎是天經地義，因為在這個所謂「人生而平等」的移民國度裡，「非我族類」的種族歧視和經濟能力往往可以決定社會地位。然而慘遭歧視與排斥並非有色人種的「專利」，在特殊氛圍下，就算是白人，有時也難逃被迫害的命運；特別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現象一再出現在美國社會。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義、日是美國的強敵。儘管這三國的移民已在新大陸落居多年，也向美國政府宣誓效忠，但基於不信任的心態，他們的後裔在戰爭期間仍吃盡苦頭。有的失去人身自由，只能居住於某一特定地區，更沒有遷居、旅遊的自由；有的失去言論自由，不可隨意批評時政；有的則被剝奪閱聽自由，禁止閱讀某些報章雜誌或任意聽取廣播——他們形同是在「白色恐怖」下過日子。具有這三國血統的後裔，更成為「敵國僑民」！即使白種移民，也會因祖國選擇不同陣營，就得跟著遭殃，例如德義兩國移民雖是白人，在兩次大戰同樣面臨歧視與欺辱，《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 2008）和《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 2007）就是最好的說明。這種部分白人擔任弱勢「他者」的現象確實驗證了「弱者，你的名字是他者」這句轉化自莎士比亞名句的真實性。

在《海蒂的天空》中，16歲的海蒂長年寄人籬下，看人臉色，讓她感到十分厭倦。因此，一聽到從未見面的查斯特舅舅在蒙大拿留下大片土地等她繼承，再加上赫特叔叔的鼓勵，她便決心去找尋屬於自己的家！

在全然陌生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家，對於正值青春年華的海蒂來說，是一項挑戰性十分高的工作。幸好有德裔朋友卡爾·慕勒一家人的幫忙，與幾位善心人士的加持，使她有力氣繼續苦撐下去。

除了冰雹、旱災、大風雪等天災外，她還得應付不定時發生的「排德」人禍。原來，當地部分與三K黨持同樣理念的反德人士，四處放火惹禍，並做出口頭威脅，連德裔法官也難逃劫數！海蒂勉強苦撐了一年，最後不得不放棄。她的失敗不全然是天災造成，種族歧視也是主因之一。

《幸運小銅板》的主角——小銅板（芭芭拉），她的義裔爸爸因為擁有短波收音機被捕，死於獄中，這是她媽媽（純種美國人）最大的悲痛，從此不願再碰觸過去的傷心往事。但即將滿12歲的小銅板，卻想要深入瞭解這段往事，因為它涉及自己最喜愛的叔叔多明尼克——她知道他為什麼自暴自棄的過日子。故事結尾時，小銅板終於從吉娜嬸嬸口中得知父親的真正死因，他是荒唐年代的不幸犧牲者！

細讀這些作品後，我們發現，作家關懷的並非某一特定族群，而是就歷史史實的進程，讓

每一個在美洲大陸上曾受到歧視的族群都有機會表白自己受到的非人待遇。這些作品也是某種型式的抗議文學。

* 文字宣揚話語權

小說書寫其實就是一種話語權（right of speech; power of discourse）的釋放與詮釋。話語權就是說話權、發言權，亦即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和權力，往往同人們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話語表達密切相關。隨著人們對話語功能和本質的認識越來越深化，對話語權作用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化。義大利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倡導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奪取資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即話語權，來瓦解資產階級的集體意志，從而為最終奪取資產階級政治權力創造歷史條件。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他認為話語不僅僅是思維符號，是交際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並能直接體現為「權力」。

出生在加勒比海馬丁尼克島的法農後來在法國完成學業，全用法文寫作；薩伊德在耶路撒冷出生，但他在美國完成學業，著作以英文為主；宣導生態正義的印第安女作家霍根（Linda Hogan）的主要作品全用英文書寫。他們三人的寫作經歷告訴我們，作品要有影響力，必須使用世界當代的強勢語言書寫，等於擁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話語權，才能宣揚自己的理念，作品的影響力才能從自身延伸到想影響的人身上，包括敵人在內。

從上面分析的作品裡，我們多少可以瞭解一二，甚至《海狸的記號》的沙克尼和阿汀祖孫二人也有這種體認。白人男孩麥特決定把唯一擁有的書《魯賓遜漂流記》送給沙克尼祖孫，沒想到沙克尼卻要求阿汀把獵獲的鳥和兔子送給麥特，來交換麥特教阿汀認識「白人的符號」，理由是印第安酋長看不懂白人符號，交易不公平，白人常輕而易舉的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沙克尼深刻體會文字的急迫性，便強迫阿汀跟麥特學識字。他所關注的只是眼前土地買賣的問題而已，但如果深一層思考，印第安人不識白人文字，則白人可全由自己立場出發，以白人利益的角度去詮釋印第安人的歷史，因為沒有文字，在歷史上往往就失去了發言權。

其次，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說，獲得話語權往往是種「可望不可得」的奢望，只能耐心等待自己的子女完全融入當地社會，語言應用純熟自如，才有希望爭取該有的話語權。書寫《龍翼》和《龍門》的作者葉祥添是第三代移民，《閃亮，閃亮》的作者角畑是第二代移民，創作《月夜仙蹤》的林珮思也一樣。《再見木瓜樹》的作者是越南難民，但小小年紀與兩位兄長就被迫提前融入完全陌生的社會，為了生存，就得認真學習全新的語言，即使這幾位作者的要求目前不盡相同。

美國雖然堅稱自己是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但單憑「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並不見得能徹底解決膚色歧視、族群互斥的難題。呼喊族群融合的口號不停的更換，顯示其效果並不理想。從「大熔爐」的口號出發演變為「沙拉」（不同人種各有特色地展現在同一個沙拉碗裡）到所謂的「拼布」比喻（如《海蒂的天空》派瑞麗所說：「……拼布就像交朋友。……越是不一樣的布，越是不一樣的人，放在一起才越美。」）美國的族群問題仍然是個有待更進一步探討與解決的問題。

九十多年來，紐伯瑞得獎作品將近四百冊，每一本作品都是時代記憶的一部分。不分族群，從多元角度出發，關懷的是青少年成長問題。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相當多的不同膚色的族群

為了改善生活，紛紛移民美國。不同族群的彙集，各有自己的故事。透過檢視這些故事中不同種族的青少年，種族歧視問題被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藉由這些動人的故事，後輩子孫也可知道先人的艱苦奮鬥過程。這些絢麗炫目的作品，透過不同語文的翻譯，給全世界青少年以及家長、教師，帶來閱讀的喜悅，同時也因內容的豐富，撞擊到實際的人生，在喜悅之餘，也給予省思的機會。

參考資料

1. 伊麗莎白·喬治·史畢爾作，傅蓓蒂譯。《海狸的記號》（臺北：臺灣東方，2003） ISBN 9575706994
2. 蜜爾德瑞·泰勒原作，莫莉譯。《黑色棉花田》（臺北：智茂，1995） ISBN 9575354222
3. 伊比作，葉美利譯。《龍翼》（臺北：智茂，1992） ISBN 9575353196
4. 勞倫斯·葉原著，葉美利譯。《龍門》（臺北：智茂，1995） ISBN 957535771X
5. 辛西亞·角畑作，張子樟譯。《閃亮閃亮》（臺北：臺灣東方，2006） ISBN 9575708148
6. 賴曇荷著，劉嘉路譯。《再見木瓜樹》（臺北：天下遠見，2012） ISBN 9789863200734
7. 克比·萊森作，丁凡譯。《海蒂的天空》（臺北：臺灣東方，2008） ISBN 9789575709068
8. 珍妮芙·賀牡作，李曉琪譯。《幸運小銅板》（臺北：臺灣東方，2007） ISBN 9789575708931